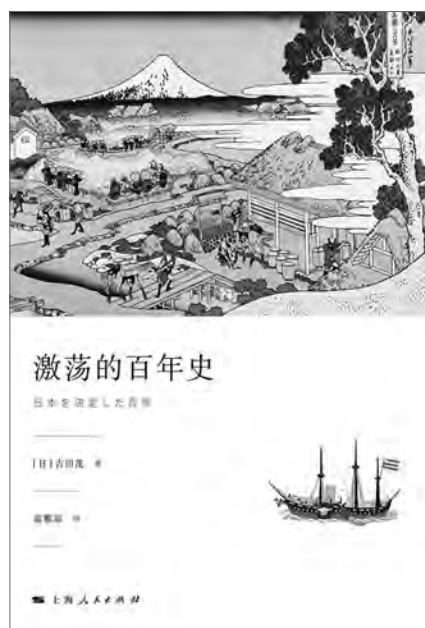


近代日本國族轉型心史

——評吉田茂《激盪的百年史》

● 許章潤

日本的現代轉型與近代德意兩國頗相類似，但在轉型半途跌宕以後「重啟改革」這一點上，又似乎與中德轉型分享了某種共同性，特別是與中國的近代歷史可堪比較。《激盪的百年史》為還原日本國族轉型心史提供了原始素材。



吉田茂著，袁雅瓊譯：《激盪的百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日本的現代轉型與近代德意兩國頗相類似，但在轉型半途跌宕以後「重啟改革」這一點上，又似乎與中德轉型分享了某種共同性，特

別是與中國的近代歷史可堪比較。自明治維新以來，轉眼一個半世紀逝去，日本現代進程所展現的這種路徑選擇，形制既已落定，見諸組織，踐諸日常，其較英美一系或者法俄現代歷史，凸顯了世界近代八大轉型案例中的「日德」形態^①。轉型期間，其與歐美列強互動、取法近世西洋強盛原理而導致現代性之野蠻性發作，以及秉持「日本天職」觀念調處東方鄰邦關係諸項，構成了這一轉型必須應對的外部問題，以及事後回溯方可冷靜理述而無法迴避的內在難題。

眼前一冊《激盪的百年史》（引用只註頁碼），即為日本政治家吉田茂述往追來的總結之作，為還原日本國族轉型心史提供了原始素材。該書於1967年出版，中文版恰於2018年刊行^②，時惟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四十周年，也是中國近代第三波改革開放的第四十個年頭^③，而華夏大轉型顛覆不已，距

離最終落定依然有待「臨門一腳」，此時此刻回首、研讀扶桑往事，更且饒有趣味。

一 「封建制度建立了近代國家的基礎」

晚近三百年的全球現代轉型，在法政層面，其宗旨、其任務，不外「建設現代國家」。其間約分兩層，而第次伸展提漸。一是完成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實現從朝代國家、封建國家或部落國家向民族國家的轉型，搭起一個「民族國家—文明立國」的框架，並以此作為基本文化和政治單元，組構出列國統攝於條約和霸權雙重轄制之下的世界體系。就實際情形來看，一些國家係帝國崩解或殖民體系解體的產物；另外一些則如美國，可謂「平地起高樓」，在一個原本不存在國家的時空建國；還有一些如德意志，經由「統一」，在語言—文化共同體的基礎上拼合出一個政治共同體。二是在此框架基礎之上升級換代，建設「民主國家—自由立國」格局，落定於立憲民主的優良政體。儘管具體形態紛呈，但實質在於讓「人民出場」，奠立其國家主權者位格，從而以立憲民主當軸，支撐起文明共同體的政治大廈；而組構出完整國族，則一般無二。但凡這兩步走完，即意味着國族挺立，現代事業竣工，歷史終結。此後若能再進一步，展現「文明國家—文化政治」的建構能力，全看造化，端賴地利天時。當然，就一般情形而言，具體落實到諸族諸

國，其程式、其步驟，則情形各異，成就與境界各有差別。

在此，日本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個案，不僅在其迄今為止的成功，而且更在其獲得成功的曲折經歷提供了值得記取的教訓。大致而言，日本成為一個現代常態國家，特君主立憲建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復興是一大轉折節點，接續了所謂「明治事業」或者「明治進程」。其間種種，彷彿奇迹。表面看來，外力主導，維新改革迅捷而穩健，成功出乎意料；而考其內裏，實則早已積蓄張力，歷史千迴百轉，只待皈依正途，便可加速上路。其中得力因素之一便是現代國家所需之建制化，它是現代事業賴以立腳而騰飛的形制基礎；雖經二十世紀30年代以還的軍國政策及其戰爭歧出，建制化基礎卻根本依舊，乃至於益發強化，而為戰後的轉型與建設預先奠立了強有力基礎，隨後的一切才有了得堪恃立的依託。

不過，說來有趣，日本之為一個國家的建制化基礎，不是明治的產物，而早已奠立於德川幕府時代。在此時代，日本「形成了統一的國家，有了通用的語言」（頁14），為明治承襲而享有的制度初始條件。正是這封建的餘蔭，得以庇佑新政。的確，在「和平、停滯與孤立」的德川幕府時代，悠悠二百六十年，經由建制化進程，日本逐漸統合為一體，真正成為一個國家，具備了國家的形制，而為後續翻新預為作業。在吉田茂看來，特別是官僚體制與管理人才的作育為國家兜底，後來明治時代的殖產興業與大規模現代改革才得以推動，

日本成為一個現代常態國家，特君主立憲建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復興是一大轉折節點，接續了所謂「明治事業」或者「明治進程」。其中得力因素之一便是現代國家所需之建制化，這早已奠立於德川幕府時代。

本書主要旨在向歐美諸邦做一了結性說明，意在向歐美介紹「日本問題」的來龍去脈，促進世界尤其是歐美對於日本的了解、諒解與和解。作者下筆謹慎中和，不無自省卻又絕不自污。

這才有了日本作為「國家」的初始條件。如吉田茂的觀察：「封建制度建立了近代國家的基礎。」(頁14)此亦類如二戰後德國的迅速復興，有賴此前源自「1871」的官僚體系與人才積蓄，只待國家轉向，立馬用如利器。另一面言，其與現代社會及其資本勢力孕育於封建母體、而打破這個母體方能脫穎而出的西歐現代進程，尤其是英法歷史，倒有幾分相像，而與中美迥異。

不過尚需指出的是，較諸中德兩國，逮至二戰，日本不僅如吉田茂所言，「歷史上從來沒有遭受過外族的入侵，是個金甌無缺的國家」(頁123)，而且，縱然戰後有一段盟軍佔領時期，為美國居高臨下所主導，但卻免於德國式國土分裂及其兩國兩制，也不存在中國式持續的內戰狀態。中國自1949年以還，交戰雙方恃海僵持，亦形同兩國兩制。尤有甚者，隨着冷戰深入，戰後由美國託管的琉球諸島，其行政權居然讓渡給日本，而實則為日本接管，再度成為日本國土的統一整體；琉球經由語言、政制與經濟紐帶，與日本諸島早已一體化，更有美國重兵駐守，可謂固若金湯。這使得作為日本現代立國的「國家」這個大框架，始終未曾失落或者重組，毋寧說一直存續並維持着；而且做大坐實，為在此之上奠立政制、施展政治，提供了基礎平台。就此而言，日本幸運之至，得力獲利於冷戰，其軌迹也是不可複製的。

上述吉田茂的話寫於1967年，彼時日本已然實現戰後經濟騰飛，

重新接納於歐美，而國勢遠超於東亞諸邦，重回世界翹楚陣列。故而心氣餘裕，底氣充足，而又心平氣和，這才將前因後果娓娓道來，於批卻導窾中瞻前顧後；甚至現身說法，為改變戰後日本的世界形象，帶有向世界尤其是歐美諸邦做一了結性說明的用意。吉田茂曾經五度出相，時當危難，折衝樽俎，為戰後日本復興厥功至偉，被奉為「日本的邱吉爾」。筆者說本書主要旨在向歐美諸邦做一了結性說明，在於此書原稿為《大英百科全書年鑒》(*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1967*)的卷首論文，意在向歐美介紹「日本問題」的來龍去脈，促進世界尤其是歐美對於日本的了解、諒解與和解。故而作者下筆謹慎中和，也可以說相對客觀，於陳述中道出原委，在說明中曲為辯護。過來人說過來事，真切具體，甘苦自知，坦白而又含蓄，不無自省卻又絕不自污。當然，涉關樞機，如將戰前軍政兩界的互動以軍人擅為一筆帶過，則不免多少文過飾非，恐多有非與外人道者也④。

話題回到國家形制之於現代事業的基礎意義上來。相較而言，建設「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同樣依賴於國家形制存續這一初始條件。進而言之，「自由主義以民族國家為時空依託」這一命題更且排擡而出。有此先在，則無需為猶太式復國或者美國式「平地起高樓」建國模式煞費苦心。當然，由此而生「爭奪江山」的妄念與血腥，則為另一回事。在此，雖然早期興中會式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於此不甚明瞭，但後來迅即轉向，以共和

政體令天下，說明其於民族、國家和政治的異同，特別是對現代國家的公民分享性質已有了解，這才導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一政治景象。現代中國啟航之際的便利在於，早於秦漢奠立的國家框架，雖時見分合，卻大體維持，終成典範；而構成以政教體系壟斷的國家體制，藉考試遴銓文官的政制操作，置於浩瀚疆域之上，並統攝一方水土，恰為措置一切新政的時空條件與政治基礎。踵繼者興亡替換，大致都在這一方水土撲騰，所需用功的只是政道與治道的損益，而非如美國或者東帝汶一般，非先打出個國家疆域來再建構上層政體不可。

至於德國的「1789」與「1914」之爭，載述的彷彿是「啟蒙與救亡」的折衝，內裏不過是先要建立起國家，然後再解決這是個甚麼國家的問題，因此基礎還是在「1871」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奠定的大框架^⑥。故而，中經兩戰之挫，一度擱置的魏瑪共和必俟戰後接續發展，而終究伴隨着冷戰結束修成正果，遂有1871與1990年的兩度「統一」。只不過，第一次統一是在語言—文化共同體之上架設一個政治共同體，奠定統一的國家形制；第二次統一則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接收和兼併，國家形制未變，而政體和平轉型。在此，德意志的苦惱和麻煩在於必先經由折衝樽俎而構建出統一的國家來，然後再安排這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國家；而這居然需要兩度折衝，方始定型。《德國國歌》(Das Lied der Deutschen) 強調「國族」及其「統一」，以此作為核

心義項，就在於建國——建設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國家——蔚為德國現代事業的頭等大事，構成了德意志近代歷史的核心政治意志。此事底定，方有餘裕考量優良政體，在文化德國的基礎之上建設一個自由德國。如同「富強、民主與文明」蔚為近代中國的主流歷史意識與政治意志，源自中國近代積弱積貧，必得經由「衝擊—反應」方始騰動這一歷史進程，以上兩種修辭道出的是現代國家轉型的不同進路，只有分別置諸中德近代歷史脈絡中追本溯源，方能理解。

就此而言，中法現代轉型情形較為相似，都有祖上傳承的江山為憑，不需先建立國家，而後再討論這是個甚麼樣的國家這類美國與德國碰上的難題；而是直接進入現代國家形制建構，或和平易手，或大動干戈。「辛亥」溫煦，恰如「光榮革命」^⑥；「1789」暴虐，為此後類似的暴力革命先開一槍，勢能既大，影響惡劣。就中法而言，其所為難而一波三折的，是後一命題，也就是建設現代優良政體這一現代國家「2.0版本」，而涉關國家大框架底定之後現代政體的更新換代問題。因此，其不惟與美德兩國異態，亦與英國有所不同。法國的一統事業完成於封建王朝，大革命承繼了這一疆域，且一直要折騰到第三共和，國家形制方始慢慢落定。與此同時，中國轉型發生在大清疆域，較諸東瀛的封建存續不過二百六十年，包括大清在內的華夏帝制則綿延兩千餘載，歷經修葺，尾大不掉。愈往後來，愈益衰頹，不僅政制腐敗，而且文明腐朽。雖

現代中國啟航之際的便利在於，早於秦漢奠立的國家框架，雖時見分合，卻大體維持，終成典範；而構成以政教體系壟斷的國家體制，為措置一切新政的時空條件與政治基礎。

說如此，承載其腐敗與腐朽之水土仍存，建制依舊，大框架猶在，五千年裏，因革傳承，聳立依然。辛亥以還的政權更迭，一直到「紅色中國」登場，接手的還是這一國家，而版圖反而較之清代有所收縮。不過更重要的差別在於，倘若進境於現代國家「2.0版本」，則這一國家蔚為以同情和自由維繫的共和國，構成全體公民奠立於共善基礎之上分享的公共家園。否則，政黨綁架政府，政府僭奪政權，而國家是政權的殖民地，人民淪落為殖民地終生手捧暫住證的勞工，如此而已。

二 明治事業的始終

在1967年的這篇長文中，吉田茂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捉摸不透的國家，它雖然是東方最優秀的民族，但是自古以來就不能順應世界大勢，或自我孤立，或奉行自命不凡的中華主義，結果走上了一條被孤立的道路。」（頁92）作者此言差矣。君不見近代歐洲勢力崛起之前，東亞秩序以中華世界為中心，以朝貢、冊封或者互市為紐帶，構建起現代以前最大的國際體系，就是中國一度引領「世界大勢」，連日本亦且裹挾於此大勢，聯袂蔚為風華，怎會有孤立或者被孤立一說？扶桑唐風深植，千年以還，還以「小中華」自居而嘯嚷「日本天職」（下詳）。要是中國自古以來就「不能順應世界大勢」，則取法唐風的日本豈非誤入歧途，而近墨者黑？而且，若依內

藤湖南之見，尚有唐宋變革，何況近代大轉型之一波三折^⑦。凡此種種，以吉田茂之淵厚學養，不會不知，只不過在這篇主要寫給歐美世界閱讀的文獻中，當此冷戰方酣而世界搖盪之際，為洗脫祖國污名計，竟作此陳說，實在可堪訝異者也。若說孤立，1967年的中國確乎內外交困，內則惡鬥正酣，而自絕於外。當時適值「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冷戰形式進行，美蘇兩大集團稱霸地球，中國哪邊都靠不上，正處於孤絕時段，後來只好以「三個世界」劃分自我解圍，力爭迴旋餘地。可那並非常態，亦非固態。就在吉田茂此文發表十年之後，逶迤輾轉，中國重又成為一片開放熱土，日資大舉湧來。而自茲以還，所作所為，正同於日本戰後幡然悔悟之積勞積慧也。

那麼，日本在戰後都做了些甚麼呢？以下還是用吉田茂的話略作解釋。在本書中，這位前首相寫道：「日本在戰後所取得的成果，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日本在明治時代完成的事業的再現，而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它又是日本自明治時代開始的事業的完成。」（頁85）換言之，明治的事業並未完成，卻被攔腰阻遏，急轉直下，戰後方始重新接續，而終究完成，乃至於更上層樓。期間奉行軍國主義及對外侵略戰爭連連，凡五十年，實為歧出，既是取法西洋近代強盛原理的明治式新政所內涵的現代性之野蠻性的歇斯底里，也是對於明治時期主流政治意志的褻瀆和背叛，更是全球「戰國時代」島國危機感這一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借助強盛一步之

明治的事業並未完成，卻被攔腰阻遏，急轉直下，戰後方始重新接續，而終究完成，乃至於更上層樓。作者坦言：「明治的國家體制畢竟是用來渡過非常時局的例外體制，無法一成不變地永遠延續下去。」

先機而邪魅外溢。可能正是有鑒於此，作者才會坦言：「明治的國家體制畢竟是用來渡過非常時局的例外體制，無法一成不變地永遠延續下去。」（頁23）也就是說，日本曾經以此誤診處方打理疾患，完成古今之變，卻因文野之別而多所歧出，而終究病上加病，乃至於一病不起，於現代東西之變革中錯亂迷失。

此間情形，借用吉田茂引述1956年日本政府頒布的《經濟白皮書》的概述，概莫如是：

所謂近代化〔變革〕，就是自我改造的過程。改造的手術不經過痛苦是不行的。明治初期，我們的前輩實行了這種手術，總算把落後的農業日本改造成了亞洲先進的工業國家。此後的日本經濟沒有經歷過與此相匹敵的巨大的結構改革。於是人們打算逃避自我改造的痛苦，試圖按照自己的條件來改造世界，結果就造成了軍事上的膨脹。（頁80）

這段話闡述的是明治維新後半個多世紀中日本的經濟發展歷程，其實，用於政制與政治，亦頗恰切。故爾，戰後美國主導的政治改革、和平憲法制訂與經濟社會發展，等於「巨大的結構改革」，於回到明治進程中重續明治，而最終完成明治並超越明治，這才有了今日日本的這等模樣。吉田茂喟言，此間歷程移宮換羽，可以「無可挑剔地稱之為不流血的革命」（頁51），因而心懷感激。其之施行同樣獲得了秉持明治正宗的日人拍掌，而為精英與百姓多所認同。此與吉田茂斷言

「中國自古以來」如何如何僅僅十年後中國重啟改革開放，以「向後倒退向前進」的方式，接續前此兩波的改革開放，重新出發，正相類似。若說區別，則一億鄰居歷經波折，早已恪盡目標；而中國至今尚未臻達終點^⑧。

回應本節前揭吉田茂第一段引文，需略作鋪陳的一個背景就是，近代日人追求富強，向慕風化，只對高級文明頷首致意，乃至於低頭輸誠。往昔貞德太子之追慕大唐，近代明治天皇之取法西洋，戰後舉國對美國之俯首帖耳，循沿的均為這一理路，實為日本文明擇善而從的優秀品質，也是一種國家理性的精準算計。此間情形，同樣恰如吉田茂所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派往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同明治時代的留學生一樣，顯示出旺盛的求知欲，並取得了優異成績。他們讚賞美國的活動能力、英國的政治安定、德國「大眾汽車」的優良和丹麥農業生產的高效率，他們回憶日本的情況並與之相對照，學習那些日本應該學習的地方。（頁86）

不寧惟是，在吉田茂筆下，英美的政治、德國的勤勉與英法的「愛國性戰鬥意識」（頁126），均為優秀民族特質，千年訓育，循時進益，值資效法。故爾，雖然日本精英階層對於美軍佔領當局的所作所為並非全然贊同，但仍多所配合，乃至於衷心服膺，就在於捫心自問，如吉田茂所言，「日本人承認

戰後美國主導的政治改革、和平憲法制訂與經濟社會發展，等於「巨大的結構改革」，於回到明治進程中重續明治，而最終完成明治並超越明治。吉田茂喟言，此間歷程可以「無可挑剔地稱之為不流血的革命」。

1955年，吉田茂兩度以「改革開放」措辭，致意於引導、督促「紅色中國」轉型，而為日本未來綢繆，為東亞格局擘畫。當時冷戰方酣，日本毗鄰中蘇兩國，無異於身陷紅色包圍圈，因而如何漸令中蘇脫鈎，以減緩日本壓力，遂為長久國策。

美國與英國總體上都擁有卓越的文化」(頁86)。由此而追慕前行，循此而迎頭趕上，這才有此後的轉危為安，大步流星。因此，以當日中國之情形，若令吉田茂心服口服，不啻天方夜譚。縱便今日，雖說中國經濟成就昭彰，但一般國民之行止，以及政體轉型尚未到位，致使日人心中的中國印象也還依舊處於二等國家行列。此間心理落差與差序格局，介乎文野之別與中日之爭中間，大家都心知肚明，無需遮遮掩掩。

就世界範圍的大轉型經典案例來看，中國與德日一系分享了這種歷史進程「斷而後續」的特殊性。就德國而言，「1871」奠定國家形制之後，有待第次成長中更新換代，而不幸攪合於兩次大戰，實為歧出。從小尺度來看，身處夾縫的魏瑪共和只是個過渡階段；放眼大轉型長程、大尺度衡量，則第三帝國恰為例外體制。但例外還是常態，若國家理性蒙塵，公民理性不彰，一切遂無定說，只能等待戰爭及其深重苦難來教訓當事人，屆時再回頭，重新出發。故而，1945年以後的日本是回到明治再出發，德國則回到魏瑪、回到俾斯麥，一如「1978」的中國回到「1911」、回到「1945」，甚至回到「1860」，採取的都是「向後倒退向前進」這一曲折進路。借用上引吉田茂謂明治體制不過是「渡過非常時局的例外體制」這一斷言，不妨說第三帝國是德國「渡過非常時局的例外體制」，一如「1949」體制是中國大轉型進程中的一種非常體制，一種過渡政體與臨時憲法而已。

三 「改革開放」與「日本天職」

說來令人感慨，也正是在這本《激盪的百年史》所附《隨憶錄》中，吾人今日方得知，早在1955年夏，吉田茂便兩度以「改革開放」措辭，致意於引導、督促「紅色中國」轉型，而為日本未來綢繆，為東亞格局擘畫。

「改革開放」，正是吉田茂的原話。寫於上述文獻中的一則文字就以「引導中共開放」為標題，而關鍵在於中蘇脫鈎，方始可能。自中蘇兩分起步，「將它從蘇聯共產主義那裏剝離」，再漸至於促使中國「開國」——一個典型的明治式修辭。因此，這則文字的副標題就是「必須要使其脫離與蘇聯的關係」(頁138)。而且，吉田茂在十二年後寫作本書時仍堅信，「中國民眾在本質上存在着和蘇聯人無法相容之處」，蓋因「文化不同，國民性不同，政治情況也不同的中蘇兩國，最終必將形成互不相容的狀態」(頁73)。

之所以作此考量，就在於吉田茂深知，近代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組構世界體系，除了「血與火」，端賴於貿易自由與航海自由，自荷蘭、西葡兩國而至英日各國，無不如此。所謂自由經濟與市場神奇，不止於此，但端賴於此。因而，建構一個包括東亞在內的全球開放市場，對於已然搶佔技術與經濟高端位置，但因地狹人稠、必須依賴海外市場的日本來說，可謂事關國脈。再者，當時冷戰方酣，日本毗鄰中蘇兩國，無異於身陷紅色包圍

圈，因而如何漸令中蘇脫鉤，以減緩日本壓力，遂為長久國策^㉔。

後來中蘇不僅分道揚鑣，而且大打出手，印證了吉田茂的遠見。逮至中日建交後七年，中美終於正式建交，整個東亞情勢逆轉，全球共產集團體力不支，漸趨困頓，而終至崩解，可謂迎來了日本戰後最好的國際環境。所以，當此冷戰正酣之際，吉田茂才會如此信誓旦旦地說道：

那麼，究竟怎樣才能引導中共執行開國的方針呢？改革開放不僅有利於中國國民，還是能夠為遠東的開發以及世界經濟做出貢獻的最好政策。要曉之以理，並進行善導。……只有東南亞得到開發，中共執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才能期待我國經濟的獨立和發展。（頁139-40）

吾人今日勢必要問：以當時日本區區之力，緣何竟能扭轉中蘇大勢？除了地緣政治與貨殖經濟考量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促發推導日人作此長遠政策布局？答案是肯定的。不僅日人相信具此扭轉之力，要在合縱連橫，而且其文化心理深層彷彿以此為必須擔負的職責。由此便不能不說到「日本天職」這一概念了^㉕。要言之，至少自豐臣秀吉以還，日人精英文化政治心理深層便藏匿、升騰着踏波開拓華夏之夢，表明大一統帝國文明輸送東洋後對日人文化心理的衝擊形塑，至深至巨，不料反噬來得如此猛烈。逮至晚近中日國力逆轉，日本為尋找侵略藉口，乃以「文明中心移位」

為由，堅信「日本在中國擁有特殊的利害關係」（頁32），演化出日本負有開拓華夏及東亞之責的「日本天職論」。在這個歷經三世紀逐漸形成的理念中，日人自負甚高，終至狂妄自戕，已如歷史演示。縱便如此，吉田茂有關「引導中共執行開國的方針」這一理路，卻依然不脫此轍。在他看來，「能夠引導中共進行開國的，除了同文同種的我國國民的力量以外，別無他法」（頁138-39）。換言之，「同文同種」蔚為有利條件，而來自歷史與地理的雙重淵源，形成日本及其國民與中國「關係最深」這一天然機緣，使得他相信「推動這個政策的實行應該是有可能的」（頁139）。

不僅如此，更大原因在於日本戰後迅速復興所形成的巨大影響力，以及日本作為現代化過來人所天然享有的樣板意義。吉田茂這樣說，並非盲目自信，而是有堅實的數據支撐。在他撰寫《隨憶錄》的1950年代中期，如其所言，日本不僅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而且「至少在亞洲，日本是唯一的工業國和產業國」，置身於世界體系及東亞世界，自當負起相應職責：「戰後獨立的亞洲各國在經濟、文化方面，原先都沒有足夠的經驗，還有很多地方至今尚未實現獨立。最終結果還是要由日本來幫助他們。如果日本不伸出援助之手，亞洲的興起和未來就難以期待，這似乎已成為今日的定論。」（頁124）

十二年後，在上文提及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捉摸不透的國家」這段文字中，吉田茂再次提示

自豐臣秀吉以還，日人精英文化政治心理深層便藏匿、升騰着踏波開拓華夏之夢。逮至中日國力逆轉，日本為尋找侵略藉口，堅信「日本在中國擁有特殊的利害關係」，演化出日本負有開拓華夏及東亞之責的「日本天職論」。

日本「必須擁有引導其〔中國〕向好的方向發展的胸懷」，並進而論及日本人的「使命感」，暢言日本原本就有的「冒險精神」，而以鼓勵日本國民「擁有夢想，並到廣闊的世界中去尋求舞台」作結（頁92-93）。就此不妨說，戰後立基於世界體系論的「大國職責論」與戰前的「日本天職論」，於此多所混融，自是信心恢復的表徵，但因其中回盪着往昔「天職論」的鳴響，今天讀來，還是不能不引發出某些聯想。前文轉述吉田茂有關自由貿易的看法，曾有「除了『血與火』」一句，此為筆者的補論，就在於將吉田茂不便明言、而實際曾有的真實歷史面相抖露出來，以說明實際進程本身之複雜詭譎，所謂貿易自由與航海自由的背後總是潛伏着實力的較量。其於建構現代世界體系的真實有效性，一如貿易自由和航海自由架設起現代世界一般真實無欺。而這就是國家理性，也是所謂現代國族的政治成熟。

四 擇善而從的國家理性

戰後日本面臨的一大問題，也是明治時代早就觸及而幾經歧出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與世界」的關係。「開國」與「攘夷」的對立，不過為其早期形態；而後橫絕亞太的擴張國策與文官政府的相對守成之間的緊張，並以後者的退縮而告終，才是禍端所在。要說比擬，則晚近出現的「中國與世界」、「美國與世界」，以及早年的「德國與世界」的關係，略相類似。置身

近代，全球一體，權勢轉移和國勢起伏導致新舊勢力的詭譎重組，將此難題更加嚴峻地和盤托出，如英國之挑戰西班牙與英美權勢轉移、德俄日之挑戰英美、伊斯蘭世界的絕望性反擊，以及此刻正在上演的美中角力，均將此張力鮮活呈現，而令人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於此可見，「世界」的範圍表現出不確定性，隨歷史進程推移而伸縮。就吉田茂執筆時的日本來看，「世界」首當其衝而需要即刻應對的，就是代表這個「世界」的佔領者美國，然後擴展為東亞諸國、歐洲諸邦與共產國家，包括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在此既是鄰邦，亦為共產集團的一員，還是一個「自古以來」如何如何的落後國族。面對困局，戰後日本汲取教訓，服輸認慫，而終究擇善而從。在大國環伺而波詭雲譎的錯綜格局中，日人以文野之別、價值判別和利益趨導這三大認識為主軸，確定主次輕重，劃分中心與邊緣的界限，漸次錘煉出不卑不亢而頑強堅韌的現代日本國家理性，也是一種精於算計的世俗政治智慧，終於成功實現和平復興。

首先，戰後日本承接明治思緒，拋棄東西界限，以文野之別定位親疏。如同吉田茂所說，雖二戰駁火慘烈，日本卻咸認英美為高階文明之國，仍然值得向化輸誠，據此確定日本在世界體系中的基本定位，超越孤懸滄海這一東亞地理空間局限，親親而疏疏，遠交卻近攻。而回頭一望，二戰時日本未能銘記前賢戰前的警告，選擇了親近德意卻與英美開戰的錯誤路線，等於顛

就吉田茂執筆時的日本來看，需要即刻應對的就是代表「世界」的佔領者美國，然後擴展為東亞諸國、歐洲諸邦與共產國家，包括與中國的關係。日人以文野之別、價值判別和利益趨導為主軸，終於成功實現和平復興。

倒了這一文野之別。定位既已錯亂，遂將明治事業「毀於一旦」^⑩。然而，本文前揭吉田茂譏評華夏文明，通篇檢討戰前日本國民不幸為愛國熱情所誤導，加上軍部狂躁僭越，以致將日本拖入戰火等言論，卻不見對於因日本野蠻侵略而遭受最為深重災難的文化母邦的任何歉疚之言，哪怕隻言片語；相反，倒多譏諷諷刺，甚至不無敵意，就在於置其文野之別譜系中，中國既非同一層次，而且於立國價值分野，亦非同一陣線，遂不入法眼中而彷彿了無虧心也。

中日後來恢復邦交，乃至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同樣基於國勢擾攘，一切服從於本國利益最大化這一根本考量。其間，日本特別慮及中蘇分道揚鑣後的東亞局勢與中國崛起的未來必然性。當然，中美互動影響風從，一舉扭轉冷戰格局，從而撬動了最後終結冷戰的行程，才是最為重要的外部因素。從尊王攘夷、一心效法歐美，到不甘順從而作出反抗，再回歸到認同高階文明之路，日本用自己將近一個世紀的實驗，最終確定了現代日本的價值趨歸，展示了近代全球體系中現代文明成長的一般性。

此處所謂「文明成長的一般性」，就是說，為文明成長必須親善世界高階文明，也就是所謂的主流文明，藉由文明由高至低的自然流向來充實提澌自身，作育自家的文化，並於漸臻佳境後輸出反哺。此非惟近世歷史所揭示，實為「自古以來」文明發展與文化作育的一般性，而且早已昭彰再再。對於吉田茂而言，此認知定位涉關日本如

何安身立命於現代世界。而在他看來，「自古以來」日人恰恰具有「主動吸收外國文明的精神」這一「傳統性格」（頁11）。故而，經由一切手段——經濟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促進日本國民對於國外文化的了解融通，不惟功在文化融貫，而且有益於邦交，助力於國家間政治，也就為日本存身世界創造國民條件。否則，「一個在文化上處於世界邊遠地區的國家，非常容易發生思想偏狹或毫無根據的乖僻猜疑，並滋生狂躁的愛國心和傲慢心理」（頁162-63）。

上述吉田茂之語雖是大白話，卻為不易之理。之所以從作為政治家的吉田茂口中說出令人感懷，就在於此話寫於戰後第十個年頭，是全程經歷過國家曾經過度膨脹而最終戰敗的政治家的痛定思痛之言。吉田茂曾經長期出使，遍歷歐美，知己知彼，這一身心經歷在其執政後終於內化為開放寬容的文明觀，於日本與世界，均可謂善莫大焉。當然，所謂「國外文化」，依舊主要為高階文明，然後才是其他值得了解的文化。日人近世開國後，不遺餘力譯介歐美文化，出洋留學，乃至於巨資收購西洋藝術藏品。而近年新生代多不願出洋深造，不僅在於日本頂級大學已然蔚為世界一流，看來無需再捨近求遠，而且還似乎因為優裕日久，生計無愁，則危難已遠，安享目前，乃銳志不再也。

其次，面對壁壘森嚴的世界秩序，以價值判別決定政治趨避，旗幟鮮明地歸附於自由世界。其時，「世界」歷經重組，主要特徵表現為

戰後日本承接明治思緒，拋棄東西界限，以文野之別定位親疏。日本咸認英美為高階文明之國，值得向化輸誠。而置其文野之別譜系中，中國既非同一層次，而且於立國價值分野，亦非同一陣線，遂不入其法眼。

面對壁壘森嚴的世界秩序，日本以價值判別決定政治趨避，旗幟鮮明地歸附於自由世界。吉田茂堅決主張以日美邦交和同盟作為外交的「根本原則」，必須確保日本不受共產蠱惑，嚴防國內的共產行動。

「自由國家群與共產國家群」兩分，也就是慣常所說的「自由世界」與「極權國家」的對壘（頁132）。兩大集團的冷戰，在四十多年裏決定了戰後世界的根本走向。日本夾處其間，究竟是保持中立，還是毅然決然趨歸英美主導的自由國家群，國內輿論並不一致。其間既有左翼思潮囂嚷，亦有關於立國之地緣利害考量。特別是隨着蘇俄崛興，日本國內的共產思潮似乎蠢蠢欲動（頁100、136、151-52）。面對此情此景，吉田茂認為，防範共產滲透，阻止左翼攪局，切切不可掉以輕心，否則必釀大禍。在《隨憶錄》中，對此着墨頗多，反覆陳述，可見作者的焦慮。

至於所謂「中立論者」，在吉田茂看來，顯然缺乏「知識觀念」（頁132），亦無「世界性外交意識與判斷能力」（頁128）^②。他們兩邊討好，看似乖巧，實則不僅可能招致兩方都不信任，而且置身冷酷的國際關係，若無切實國防與同盟互恃，以日本區位之惡劣與國力之單薄，雖有經濟財富自恃，實則連自保亦難。吉田茂痛陳，「僅僅憑中立或者不可侵條約來守衛國家的想法只是理想家做的美夢」（頁132）。問題在於，置身「忘戰必憂，好戰必亡」兩端，恰需拿捏分寸，過猶不及。吉田茂一再提示，其所展現的不僅是戒慎戒懼的現實主義政治意識，同時是以清明的政治家心智錘煉着日本戰後的和平國家理性。

因此，吉田茂堅決主張以日美邦交和同盟作為日本外交的「根本原則」（頁133），不要受利益誘惑而輕易調整外交格局，「把過多的

希望寄託在和共產圈的貿易上」（頁137）；必須確保日本不受共產蠱惑，嚴防國內的共產行動。他的藥方是取法英美發展經濟一途，認為美國的「經濟景氣讓共產黨的活動無法進行」，日本「最好的方法也是和英美一樣招徠經濟景氣」（頁152）。今日回頭一望，日本歷史上曾有紅色勢力囂然，影響及於華夏，幸有吉田茂這類政治家警醒，保證了日本循沿自由國家路線一路前行。

吉田茂之所以如此強調基於政治價值的「選邊站」，根本還是在於共產國家所昭示的極權政治的殘暴，敲響了世紀警鐘。此可見於他對於中蘇的評論。例如，說到當時的中國，尚有寫於1955年的這樣的批評：「中共近年之所以不被自由各國接納，就是因為它無視條約、懈怠履行國際間的義務，扣押他國人員或以間諜的罪名處刑等一系列的行為受到了各國的強烈反對。」（頁143）對於其他共產國家如東德，吉田茂認為其政府「完全不為提高人民生活 and 發展經濟着想」，導致大量百姓逃離，蜂擁西德（頁151）。至於共產老巢的蘇俄，在他眼中，「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國家」（頁136），並感喟當年日本戰敗後「如果是由蘇聯作為佔領的主力，戰敗之上另外再加一層悲慘的狀況是不難想像的」（頁130）。這也就是日本戰敗之際，著名的「近衛奏摺」主張受降於英美而抵制蘇俄的原因。其間一大因素是英美不會改變「日本國體」，但較此更為嚴峻的考量是不要因為戰敗而引發共產革命（頁100）。相較

而言，確如事實早已表明，且令吉田茂由衷感佩的是，「美軍不僅是作為勝利者，更是作為改革者，為推進日本的『非軍事化』而進駐日本」，並成功地進行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頁50-51）。

再者，面對政經利益錯綜糾結的世界與日本以貿易立國這一根本現實，日本以利益趨導，分別應對，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吉田茂的基本思路是，除了歐美的商貿往來外，堅拒蘇俄的任何貿易誘惑，逐漸「引導」中國「開國」，再建立商貿往來。他展望一旦中國和亞洲其他區域進入世界貿易體系，「毫無疑問，世界經濟將會迎來巨大的飛躍」（頁141）。同時，要抓緊開拓世界市場，尤其是東南亞市場。他認為日本應當負起亞洲的責任，沒有東南亞的經濟成長，不僅日本在政治上缺乏穩定，而且也無法展開基於消費能力的大規模貿易。後來隨着亞洲的經濟成長，特別是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啟航，日資大舉進入中國，實現了技術—資本與市場—勞動力的有效對接，迎來了在所謂「雙贏」基礎上的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騰飛，塑造出一個愈益呈現取替大西洋文明時代的亞太時代，更進一步發展成為今日之印太戰略大格局，則經濟牽連於政治，政治反過來促進世界格局中的權勢轉移，自是昭昭在目。

綜合吉田茂的前後論述，無論是文野判別還是政治選擇，以及關於貿易與市場的考量，不難看出，其所思所慮，一切旨在維護日本的和平安定，着力於提澌國民生計。就此而言，可謂接續並修正了了明

治正義，道出的是戰後較為安心地作為和平常態國家的本心本願。

五 「說明書」與「陳情表」

走筆至此，不難看出，日本的戰後重建在形制上受控於美軍佔領當局的擘畫，內在理路上則更多地從歷史汲取精神力量。首先，若說明治事業主要取法西洋，走的是「脫亞入歐」的路，且出現過類似「『遷責殺父』情結」式的文化糾結與精神錯亂^⑬，則戰後復興除了接續明治正脈外，也從歷史與文化精神中找尋支撐。滿目瘡痍，超逾半個世紀的發展毀於一旦，四顧徬徨，何處立腳，是當日日本朝野的困境及心理創傷。正如吉田茂筆下所述，拋開外在因素，日人屢遭災難而後起步的歷史記憶所培育的堅忍性格、儒家倫理薰陶的勤儉積蓄家風與服從協調的人格特質，以及認輸向善的國民性和吸收外來文明的開放胸襟，實為歷史賜予日人的精神財富，日本於戰爭廢墟中積蓄心力，並終於開花結果。中國近代遭遇西力東漸，幾乎屢戰屢敗，進而自信全失，卻於西潮洶湧之際屢現所謂「傳統文化熱」，推動了對於中國傳統的批判性解析，更且深溯至樞紐時代乃至前樞紐時代，於歷史縱深找尋精神資源，其心態、其進路、其作派同出一轍。其實，放眼各大樞紐文明的近代轉型與亞非諸國取法歐美的近世變革，無不如此，則歷史塑造了人性，因而歷史性就是人性，更是人性面對變局之際最為深厚的心智資源。

面對政經利益錯綜糾結的世界與日本以貿易立國的根本現實，日本以利益趨導，分別應對，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吉田茂的基本思路是，除了歐美的商貿往來外，堅拒蘇俄的任何貿易誘惑，逐漸「引導」中國「開國」，再建立商貿往來。

放眼世界體系尋找國家定位，是貫穿一個半世紀日本大轉型歷史進程中最為明智慧達之舉。今日中國國力升騰，但面臨內政轉型不進則退，而外部中西之爭烽火重燃，則何去何從，同樣亟需置身世界體系審視。

其次，放眼世界體系尋找國家定位，在國際格局中確定日本的進退出路，是貫穿一個半世紀日本大轉型歷史進程中最為明智慧達之舉。而中間歧出的一段，特別是侵略中國，與美國開戰，效法西洋列強，希圖帝國夢圓，恰恰在於喪失方位感，不明白自家的分量，以至於功敗垂成，金甌玉碎。故而，戰後日本以文野之別、價值判斷與利益趨導為綱，拿捏分寸，分辨親疏，定奪取捨，實為此種洞察力與現實感的回歸。據說今天日本願以二等強國身份於中美之間折衝樽俎，在印太格局裏左右逢源，確保國族利益，同為此種洞察力與現實感的表現。看似柔弱，每多周旋，不避迂迴，而實則剛健。兩相比對，時移勢易，今日中國國力升騰，但面臨內政轉型不進則退，而外部中西之爭烽火重燃，火焰愈熾，則何去何從，同樣亟需置身世界體系審視，在「古今中西」的大格局中，審慎措置，小心應對矣。

再者，日人自明治以後的歷史（除了歧出一段）表明，當日操盤者深具世界文明史意識，展現了一種向化輸誠以自勵而後成的文明史觀，也是一種平實的歷史進化論。實際上，從德川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和魂洋才」而進至全盤西化，日人一路走來，融合現代與傳統，如戰後吉田茂回視所述：「即便引進外國的科學技術文明不成問題，但要引進構成其文明基礎的政治體制、文化以及思想方法卻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這種所謂的價值體系，如果不是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依靠國民自身力量形成的話，

是無法被人們接納為真正的道德基礎的。」（頁20）

此處關鍵是將舶來「價值體系」轉化為「道德基礎」，必須經歷漫長的調適過程，積澱為奠立於文野之別的價值認同，熔鑄於日常倫理，方能行穩致遠。吉田茂以土地改革為例解釋了為何戰後進行的諸項改革中，「最終能在日本落定生根的都是原先在日本國內就有某些基礎的改革。而原先沒有基礎的並且不適合日本國情的改革，在日本恢復獨立以後似乎都被做了修改」（頁55）。不過，「國情」並非一成不變，體制因應情勢流轉而生變，當也順理成章。饒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吉田茂於書中三度提及「島國劣根性」，而更有深意存焉（頁148、156、158），則又另當別論，外人不遑置喙矣。

順帶說一句，正是在此文明史觀引領下，不幸中之萬幸的是，日本雖有共產思潮出沒，卻終究未曾為其所裹挾，而能持守君主立憲民主政體為根本國體，一以貫之。據吉田茂所述，日本高層在戰爭結束之際最為擔憂的便是共產革命乘隙橫絕，更擔憂蘇聯佔領後生民塗炭，故而速降美國，終在美軍佔領當局主導下和平改革。吉田茂聲言日人對於佔領當局毫無怨恨，更對「麥帥」深懷感戴，緣由在此。這不僅是日本的生機，也是日美雙方的轉機。此與中國不幸為共產狂潮顛覆，終至生民塗炭，兩相比堪，更堪慨歎。

最後，回歸常識倫理，保持清醒的世俗理性和政治現實主義，揭窳了日本近代轉型的政治心智和一

般民眾心理。即如作者於〈自序〉中夫子自道：「洞察力」、「歷史感」、「想像力」與「冒險犯難的勇氣」，還有精算理性，是明治事業所秉具與戰後日本努力鍛煉的政治理性。凡此種種，影響及於政商學民，保證了日本「在國際政治的驚濤駭浪中還是機智地把握住了方向」（頁2）。就此而言，吉田茂這部向世界陳述日本的「說明書」，也是向本國民眾宣諭的「陳情表」，呈現的實為一部擇善而從的國族轉型心史也。

註釋

① 有關晚近世界大轉型的「八大案例」與「轉型四系」，詳見許章潤：〈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論綱——重讀托克維爾、梳理現代世界及其現代秩序的創生脈絡〉，載《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關於「中國問題」的「中國意識」》（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頁3-70；《法意今古》（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中「世界體系中的中國問題」一節。

② 2018年的中文版除了正文，還度譯了1955年作者發表的三十二篇《隨憶錄》。

③ 關於近代中國的「三波改革開放」，參見許章潤：〈建設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載《政體與文明：立國·立憲·立教·立人》（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6），頁2-77。

④ 將步步催逼、逐漸擴展的侵華戰爭諉責於「軍部的一夥人」，以軍人擅行來忽略整個體系的力量，掩蓋了日本政府和國家對此所應擔負的道德與政治責任，堪為敗筆。參見《激盪的百年史》，頁34-35。

⑤ 參見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著，彭剛、顧杭譯：《德國的歷史觀》（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許章潤：〈置此邦國，

如何安頓我們的身心——從德國歷史學家邁內克的「歡欣雀躍」論及邦國情思、政治理性、公民理性與國家理性〉，《政法論壇》，2013年第1期，頁3-20。

⑥ 代表性作品參見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郭紹敏：〈清末憲政改革時期的「新君主制」——《欽定憲法大綱》百年祭〉，《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第10期（上），頁71-84。

⑦⑩ 參見許章潤：〈「中國問題」與「日本天職」：關於內藤湖南的中國觀，主要以《禹域鴻爪》為觀察文本〉，第三節，未刊。

⑧ 參見許章潤：〈低頭致意，天地無邊：謹以此文紀念1978年重啟的「改革開放」〉（2018年12月5日），FT中文網，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502?archive；〈建設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頁2-77；〈以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載《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頁453-74。

⑨ 參見程文明、高世鷹：〈吉田茂「中蘇離間論」評述——吉田茂政治思想及其對華政策的視角〉，《北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頁54-58。

⑪ 據《隨憶錄》載述，1931年底，日本選擇與德意結盟，引發英美高度緊張，加緊斡旋，卻為日人所峻拒。為此，牧野伸顯伯爵託人帶口信給外相東鄉茂德，提醒「如果日美開戰，明治維新的大業將毀於一旦」。參見《激盪的百年史》，頁186。

⑫ 此論述是就戰前日本而言，但在吉田茂著作的脈絡中，亦適用於當時的「選邊站」國策，故而才會再度指出日本須當記取豪斯上校（Edward House）的「外交意識」。

⑬ 參見許章潤：〈「遷責殺父」情結〉，載《六事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頁145。

「洞察力」、「歷史感」、「想像力」與「冒險犯難的勇氣」，還有精算理性，是明治事業所秉具與戰後日本努力鍛煉的政治理性。吉田茂這部向世界陳述日本的「說明書」，也是向本國民眾宣諭的「陳情表」，呈現的實為一部擇善而從的國族轉型心史。